序 言 二

阅读，是一种与专业背景和思维方式的对话。我们总是通过自身的职业与关注的领域，去理解书中的世界。初读冯达旋博士的《中国千年之变：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》（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，2020 年），书中的内容就引发了我强烈的兴趣。作为一名长期从事西方文化史研究的学者，特别关注公元 700 年至 1450 年间的欧洲“中世纪”时期，我万万没想到，这部聚焦中国发展议题的著作，竟与我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关联。冯博士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意义深远的宏大命题，即从“史诗”到“传奇”的精神转型：

> 这其实反映了一种整体心态的转变，而这种变化也通过多种形式得以呈现。简而言之，人们不再一味将人生看作一场必须承受的苦难，或将死亡视作注定失败的抗争；相反，人们愈发倾向于将生命理解为一场不断探索与追寻的旅程。

从古典时代晚期至 11 世纪的西方传统中，无论是神学、文学，还是政治哲学，都普遍将世界视作充满冲突与危险的战场，人类只有在类似城堡或修道院这样的“堡垒”中才能获得安全的庇护。

然而自 12 世纪起，一种更为积极乐观的世界观逐渐兴起，这种观念将世界视为一个充满发现与冒险机会的广阔舞台。前一种观念在《贝奥武夫》与《罗兰之歌》等史诗作品中得到充分体现，其中的英雄人物常在困境中与怪兽或敌军激战；而后一种观念则在《亚瑟王传奇》等故事中获得了极致的展现——勇士踏入无径森林，开启对智慧与真理的探索。在宗教层面，同样的转变也悄然发生——信仰不仅仅体现在静修之中，

更体现在“出于对知识的热爱与对上帝的敬仰”而四处游历的修士身上。在当代大众文化中，“史诗”精神仍然存在于恐怖电影中（讲述无辜者在威胁中挣扎求生），而“传奇”精神则体现在《星际迷航》这类科幻系列电影中，主角勇敢前行，“探索前人未至之境”。从西方文化史的角度来看，我曾认为 20 世纪的中国更像是“封闭的史诗”，而美国则以“探险的传奇”自居。

正是在这样的思考背景下，我读到了冯博士的《中国千年之变：“一带一路”倡议》。在某种意义上，我将这本书视作一部现代版的《亚瑟王传奇》：冯博士既是物理学家，又似一名肩负使命的骑士，踏遍世界各地，追寻智识上的探险与突破。在他的旅途中，所遇非敌，而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老友与新知；他参与的并非战争，而是科学对话与地缘合作的机遇。作为一位科学家，他总是在寻找能够解释看似无关甚至相互矛盾现象的原理。同时，这也是一本极具人文情怀的著作，书中描绘的个人友谊令人感动，在我看来，这也是他所构想的“政治性友谊”的一种隐喻与范式。冯博士贯穿全书的一条主线是：当亚洲与西方的文化、视角与思维方式相互融合，全球将由此受益深远。从另一个层面来看，我认为这本书记录的正是中国如何从“史诗式”世界观转向“传奇式”世界观的深层转型。这一转变令人深思，也令我好奇：未来中国与美国的叙事轨迹将如何交汇？又会激荡出怎样的文明碰撞与共鸣？

五年过去了，最近重读此书，对于冯博士所洞察的那种正在崛起的全球叙事趋势，我有了更深的理解与敬意，但同时也不免心生隐忧。在我看来，当中国正积极拥抱一种关于交流与探索的“传奇式”叙事体系时，美国却似乎日渐退回至一种更接近《贝奥武夫》的“史诗式”叙事体系中。“建墙”的言论甚嚣尘上，隐喻与现实中的“战争”频频出现，而真正为求知而展开的自由探索则愈发罕见。在此背景下，冯博士的深

刻观察不仅仅是对中国崛起的肯定，也是一种对美国的提醒：要重新找回其曾引以为傲的“传奇精神”。回望历史，14 世纪以后欧洲得以崛起，某种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其世界观的根本转变。展望未来，若人类希望拥有一个真正的未来，世界各大文明唯有像冯博士所预见般，携手踏上“共同探寻”的征程，方能避免堕入无休止的“纷争与对抗”之中。

丹尼斯·克拉兹（Dennis Kratz）
美国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艺术与人文学院教授、高级副教务长、
亚洲研究中心主任